

# 政策认知如何驱动闲置宅基地流转?

## ——农户类型调节下的陇西县经验

张文斌<sup>1,2</sup>, 苏婉丽<sup>1</sup>

(1.兰州财经大学 财政与税务学院, 甘肃 兰州 730101; 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规划与评估处, 北京 100102)

**摘要:** 农户对宅基地流转政策的认知水平, 是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资源、推动宅基地规范流转的重要前提。本文从农户的主观认知出发, 基于全国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甘肃省陇西县979份农户调研数据, 探讨政策认知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机制, 并检验风险态度的中介作用与农户类型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 政策认知显著提高了农户的宅基地流转意愿。异质性分析表明, 政策认知对城郊融合区农户、偏好现金补偿与国家征收补偿农户的宅基地流转意愿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风险态度在农户政策认知与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政策认知可通过推动农户的风险态度从规避型向偏好型转变, 间接提高农户的流转意愿; 农户类型在农户政策认知与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关系中发挥显著的调节效应。此外, 非农收入占比越高的农户, 宅基地流转意愿越强。据此, 文章建议结合地理区位、农户类型及补偿需求差异, 分类推动闲置宅基地流转。

**关键词:** 宅基地流转意愿; 政策认知; 农户类型; 风险态度; 陇西县

中图分类号: F3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26)02-0059-10

## How does policy cognition drive the circulation of idle homesteads?

### —The experience of Longxi County under the moderation of farmer types

ZHANG Wenbin<sup>1,2</sup>, SU Wanli<sup>1</sup>

(1. College of Finance Taxation,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730101, China;

2. Department of Planning and Evaluation,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2, China)

**Abstract:** The level of farm households' cognition of homestead transfer policy is an essential prerequisite for revitalizing idle rural homestead resources and promoting the standardized transfer of homesteads. Starting from the subjective cognition of farm household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chanism by which policy cognition affects farm households' willingness to transfer homesteads, and examin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risk attitude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farmer household types, based on survey data of 979 farm households in Longxi County, Gansu Province, a national pilot area for the reform of the homestead syst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policy cognition significantly enhances farm households' willingness to transfer homestead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policy cognition has a more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homestead transfer willingness of farm households i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reas, as well as those who prefer cash compensation and state expropriation compensation. Risk attitude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ers' policy cognition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transfer homesteads. Policy cognition can indirectly enhance farmers' willingness to transfer by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farmers' risk attitude from avoidant to preferred. Farmer household types exert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 households' policy cognition and their homestead transfer willingness. In addition, the higher the proportion of non-agricultural income of farm households, the stronger their willingness to transfer homesteads. Accordingly, this paper proposes to promote the transfer of idle homesteads in a categorized manner by taking into account differences in geographical location, farmer household types, and compensation demands.

收稿日期: 2025-11-1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XGL024)

作者简介: 张文斌(1986—), 男, 甘肃武威人, 博士,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资产管理研究。

**Keywords:** willingness to transfer homesteads; policy cognition; household types; risk attitude; Longxi County

##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闲置宅基地的流转及再利用,已成为推动城乡要素融合发展和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sup>[1]</sup>。近年来,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农业人口大量向城镇迁移,导致乡村人地分离、农村闲置宅基地与闲置农房问题日益凸显<sup>[2]</sup>。作为新时代城乡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旨在通过制度创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要素协调成本,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体制机制保障<sup>[3]</sup>。从“两权合一”到“两权分离”再到“三权分置”,体现了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集体所有权多种实现形式的演变路径<sup>[4]</sup>。针对城镇建设用地的巨大需求与农村宅基地闲置、废弃及低效利用共存的突出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引领,党和国家不断推动宅基地改革政策体系逐步完善<sup>[5]</sup>。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宅基地管理红线、农户宅基地合法权益保障作出明确部署,强调政策落地过程中的农户行为适配与权益动态保障。然而,当前改革面临顶层设计市场化导向与基层实践“政策悬浮”并存的现实矛盾。这一矛盾暴露出,政策文本与农户行为之间存在未被打开的“认知—行为”黑箱,而传统研究对“政策认知—风险态度—生计决策”的机制解析尚不够完善,成为制约改革深化与宅基地流转利用的关键瓶颈。

近年来,学界围绕农户闲置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展开了大量研究,相关因素可归纳为客观与主观两大维度。客观层面涉及非农化就业<sup>[6]</sup>、产权制度<sup>[7]</sup>、区域特征<sup>[8]</sup>等因素;主观层面则涵盖价值诉求<sup>[9]</sup>、人力资本<sup>[10]</sup>、身份感知<sup>[11]</sup>等因素。研究表明,农户流转意愿显著受其主体认知能力及外部环境的影响<sup>[12]</sup>,具体体现在农户受偿意愿<sup>[13]</sup>、产权认知<sup>[14]</sup>等方面。随着研究深入,部分学者在“三权分置”政策背景下,进一步探讨农户主观认知与行为决策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影响因素<sup>[15]</sup>。值得关注的是,风险感知逐渐成为重要研究视角。已有研究不仅证实风险感知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具有抑制作用<sup>[16]</sup>,还揭示了农户风险承担能力对其流转意愿的作用机制,凸显了心理因素在宅基地流转决策中的重要性<sup>[17]</sup>。此外,还有学者从劳动力转移类型<sup>[8]</sup>、代际分化<sup>[14]</sup>与人口流动<sup>[18]</sup>等视角切入,探讨农户类型差异与其宅基地流转意愿之间的关系。综

上,现有针对宅基地流转的研究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是现有研究尽管已识别出“风险”是影响农户退出意愿的重要因素,但是对“风险态度”主观心理认知的分析明显不足,且政策认知对农户流转意愿的中介作用尚未被充分揭示;二是对农户分化的分析多停留在将其作为独立影响因素,未能深入检验其在“政策认知驱动宅基地流转”中的调节作用,难以解释农户分化背景下的决策差异。鉴于此,本文利用陇西县农户调查数据,考察政策认知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并以农户风险态度为中介变量、农户类型为调节变量,实证检验政策认知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期为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盘活闲置宅基地、优化政策实施路径提供可落地的经验参考与决策支撑。

##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一) 政策认知对农户闲置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个体行为意向由态度、主观规范与感知行为控制等心理因素共同驱动<sup>[19]</sup>。这一理论为解读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提供了核心分析框架,但在实际运用中需结合我国宅基地保障与资产属性并存、产权模糊、社会保障依赖等特殊制度背景进行调整。首先,进行态度层面的调整。农户对闲置宅基地流转的整体评价是态度。由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尚未完全覆盖,农户将宅基地视为重要的兜底保障。“三权分置”政策明确了“资格权保留、使用权可流转”的核心规则,而政策认知的提升,有助于农户清晰地识别“不失资格权”的保障红利与“使用权流转”的资产收益,从而形成“收益大于风险”的积极态度,增强其流转意愿。其次,对主观规范进行调整。主观规范是农户感知到的社会压力。Rohit等学者经过研究,把主观规范分为指令性规范与示范性规范<sup>[20]</sup>。其中,指令性规范指政府法规、政策宣传和监管措施等强制性约束;示范性规范指亲朋邻里、示范户的行为示范和意见参考。在“集体所有权嵌入”的情境下,“三权分置”政策的实施,不仅强化了村集体在土地流转组织与政策宣讲中的主导地位,也进一步巩固了具有积极导向的制度规范对农户行为的引导作用。同时,该政策通过明确的权利边界和完善的保障机制,为农户提供了清晰的行为指引,使其对“保资格、获收

益”的流转模式形成稳定的心理预期。在此制度环境下，村内实现“资格保全、收益增收”的成功流转案例，也因此展现出更强的示范效应与说服力。此类案例通过宗亲、邻里的熟人网络扩散后，形成“流转不失保障”的群体共识，从而有效激活了正向的示范性规范。政策认知帮助农户理解并遵守这些规范，从而提升其流转意愿<sup>[21]</sup>。最后，感知行为控制层面。感知行为控制是个体对自身能否顺利执行特定行为的判断，控制力越强，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大。我国宅基地长期存在产权模糊、权益分配不清等问题。政策认知通过明晰宅基地的产权边界与权益分配规则、简化流转程序并对接村级服务渠道、激活区域适配的配套资源与风险保障机制，降低农户对“权益失控”“操作失控”与“资源失控”的焦虑，显著提升其在流转过程中的“可控感”，从而提高其流转意愿<sup>[22]</sup>。综上，农户的政策认知通过作用于态度、主观规范与感知行为控制三个维度，共同推动其流转意愿的提升。据此，提出假设：

H<sub>1</sub>：提高农户对宅基地流转政策的认知水平，有助于增强其流转意愿。

### (二) 风险态度在政策认知与流转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

政策认知可通过影响农户的风险态度，进而影响其流转意愿<sup>[23]</sup>。具体而言，其一，对政策核心规则的认知，能够帮助农户清晰把握“资格权保留、使用权流转”的制度底线，弱化其对“失地即失权”的风险感知；其二，对政策实践流程的认知，有助于农户熟悉流转的申请、备案等全环节规则，缓解其对流转操作不可控的焦虑；其三，对政策配套保障的认知，能够让农户了解流转中的风险防控、收益保障等相关措施，降低其对流转收益不确定性的担忧。这种由政策认知带来的不确定性感知弱化，会直接削弱农户的风险规避倾向，推动其风险态度从规避型向偏好型转变。对于持规避型风险态度的农户，宅基地的生存保障功能在其决策逻辑中居于核心地位，宅基

地流转收益难以抵消其对流转风险的顾虑，因此其倾向于维持宅基地现状；而当农户风险态度转向偏好型后，其对流转风险的容忍度显著提高，对宅基地资产增值属性的关注度显著上升，更易形成积极的流转意愿。据此，提出假设：

H<sub>2</sub>：政策认知通过推动农户风险态度从规避型向偏好型转变，降低其对宅基地流转的风险感知，提升农户的流转意愿。

### (三) 农户类型在政策认知与流转意愿之间的调节作用

基于“资源依赖—风险缓冲”理论框架，分析农户类型在政策认知与宅基地流转意愿间的调节作用。具体而言，纯农户、兼业农户与非农户的生计模式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决定了三类农户面临的资源约束程度与生计风险水平，更会在本土情境的作用下，进一步影响政策认知对宅基地流转意愿的驱动作用，最终造成不同类型农户的流转意愿出现明显分化。纯农户生计完全依赖宅基地，社保覆盖不足与本土“守土安业”的集体观念，使其将宅基地视为生存兜底保障，其流转决策受制于“失地即失保障”的风险焦虑，因此，政策认知对其流转意愿的正向调节效应最弱，甚至无显著影响；非农户已脱离农业生产，宅基地蜕变为闲置资产，城镇社保与稳定非农收入使其摆脱本土情境束缚，政策认知可精准降低制度不确定性、激活资产收益预期，调节效应最强；兼业农户家庭生计同时依托农业生产与非农就业，资源依赖与风险缓冲能力居中，受产权认知模糊、集体舆论与有限社保等多重约束，政策认知虽能消解部分顾虑，但需在保障与收益间权衡，调节效应介于非农户与纯农户中间。据此，提出假设：

H<sub>3</sub>：农户类型在政策认知对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中具有调节效应。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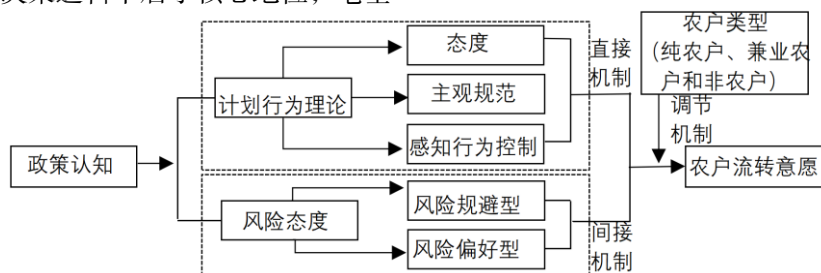


图1 理论分析框架

### 三、材料与研究方法

#### (一) 数据来源

课题组于2024年7—8月在甘肃省陇西县开展问卷调查。调研区域的选择主要考虑到:1)陇西县位于黄土高原区,宅基地细碎化与闲置问题突出,且陇西县是全国两轮宅基地改革试点地区,当地政府较早开展宅基地流转试点,为研究政策认知对流转行为的影响提供了典型实践素材。2)陇西县农户类型多样,其对宅基地功能的认知差异较为显著,便于分析不同农户群体在政策认知与流转决策中的调节作用。调研中获取1 031份问卷,剔除信息不完整的问卷后,最终有效问卷为979份,问卷有效率为94.96%。

#### (二) 变量选取

##### 1. 被解释变量(Y)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农户的宅基地流转意愿,在实地调研中询问农户“针对您家的闲置宅基地,您打算怎么处理?”回答“维持现状”赋值为0,“盘活利用”赋值为1。

##### 2. 解释变量(PCI)

本文解释变量为农户对宅基地流转政策的了解程度,运用“专家打分法”与“熵权法”,从认知形成机制、制度框架认知、政策实践认知三个维度构建综合指数对政策认知进行测算,具体步骤如下:

(1)原始指标预处理。认知形成机制(C<sub>1</sub>):测量农户获取宅基地流转政策信息的渠道与主动程度,反映政策认知的外部输入路径。题目示例为“您主要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宅基地流转政策?”赋分规则为:“未听说过”赋值为1,“仅通过村公告、广播或村干部口头宣传等被动渠道”赋值为2,“通过邻里、亲友等社会网络间接了解”赋值为3,“通过政务APP、宣传手册与乡镇服务大厅咨询等主动获取信息”赋值为4,“多次咨询相关部门、参与政策宣讲会、对比流转案例等深度了解”赋值为5。为消除量表起点偏差,将其转换为0~4分区间:

$$C_1' = C_1 - 1 \quad (1)$$

制度框架认知(C<sub>2</sub>):测量农户对宅基地核心政策框架的掌握程度,反映政策认知的底层制度逻辑。

题目示例为“‘三权’分置中的‘三权’指什么?”正确答案需完整表述“落实集体所有权、保障农户资格权、放活宅基地使用权”。赋分规则为:“回答正确”赋值为1,“回答错误或者不回答”赋值为2。

政策实践认知(C<sub>3</sub>):测量农户对本地宅基地流转流程的熟悉程度,反映政策认知的落地执行情况。题目示例为“您对闲置宅基地流转政策了解程度为?”(“完全不清楚”=1,“不清楚”=2,“一般”=3,“清楚”=4,“非常清楚”=5)。为消除量表起点偏差,将其转换为0~4分区间。

$$C_3' = C_3 - 1 \quad (2)$$

(2)权重分配与标准化专家打分法。基于政策认知指标构建与“三权分置”改革实践,借鉴许晨曦等<sup>[15]</sup>的研究,并邀请15名专家对政策认知三个维度打分,明确C<sub>2</sub>为核心指标,理论层面重要性最高;C<sub>1</sub>与C<sub>3</sub>重要性均等。设定基础理论权重(W<sup>L</sup><sub>j</sub>):W<sup>L</sup><sub>C1</sub>:W<sup>L</sup><sub>C2</sub>:W<sup>L</sup><sub>C3</sub>=1:2:1。

(3)熵权法客观校准。在数据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通过熵权法确定指标客观权重,计算公式为:

第一步,数据标准化。对C<sub>1</sub>、C<sub>2</sub>、C<sub>3</sub>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量纲差异,公式为:

$$X_{ij}' = \frac{X_{ij} - \min(X_j)}{\max(X_j) - \min(X_j)} \quad (3)$$

其中,i=1,2,3…n;j=1,2,3;n为样本量;X<sub>ij</sub>'为第i个农户第j个指标的标准化值;X<sub>ij</sub>为原始值;max(X<sub>j</sub>)、min(X<sub>j</sub>)分别为第j个指标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第二步,计算指标比重。在数据标准化基础上,计算每个农户各指标标准化值占该指标所有样本标准化值总和的比重,公式为:

$$Z_{ij} = \frac{X_{ij}'}{\sum_{i=1}^n X_{ij}'} \quad (4)$$

其中,Z<sub>ij</sub>为第i个农户第j个指标在所有样本中的比重。

第三步,计算信息熵与熵权。按照信息熵的定义,结合第二步计算得到的指标比重,计算每个评价指标的信息熵与客观权重,公式为:

$$e_j = -\frac{1}{\ln n} \sum_{i=1}^n Z_{ij} \ln Z_{ij} \quad (5)$$

$$W_j^s = \frac{1 - e_j}{\sum_{j=1}^3 (1 - e_j)} \quad (6)$$

其中,  $e_j$  为第  $j$  个指标的信息熵;  $W_j^s$  为熵权法测算的客观权重。

经计算, 各指标熵权法测算的权重为:

$$W^{C1}: W^{C2}: W^{C3} = 0.273: 0.428: 0.299。$$

专家打分法确定主客观权重的组合系数。15 名专家对两类权重的可靠性打分, 基于得分确定组合系数。理论权重系数  $\alpha = 0.521$ , 熵权法权重系数  $\beta = 0.479$ 。综合权重计算公式为:

$$W_j = \alpha \times W_j^L + \beta \times W_j^S \quad (7)$$

经计算, 综合权重为 “0.652: 1.274: 0.664”。

由于核心逻辑与初始理论权重 “1: 2: 1” 一致, 且专家一致认可 “制度框架认知权重应显著高于其他维度”, 故最终采用整数化简化权重, 确定综合权重为 “1: 2: 1”。结合上述校准结果, 政策认知综合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PCI = C_1' + 2C_2' + C_3' = (C_1 - 1) + 2C_2 + (C_3 - 1) \quad (8)$$

其中,  $PCI$  得分区间为 0 ~ 10 分, 得分越高, 表

示农户政策认知水平越高。

### 3. 中介变量 (RK)

本文中中介变量为农户的风险态度。在实地调研中, 笔者询问农户 “面对新技术、新政策等新生事物, 您的接受意愿如何?” 根据意愿高低赋值 1~5, 分值越高, 表明农户的风险偏好程度越高<sup>[24]</sup>。

### 4. 调节变量 (FD)

本文调节变量为农户类型。参考牛星等<sup>[25]</sup>的研究, 依据农业生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 将农户分为三类。当农户的非农收入占比小于等于 40% 时, 划分为纯农户, 赋值为 1; 大于 40% 且小于等于 80% 时, 划分为兼业农户, 赋值为 2; 大于 80% 时, 划分为非农户, 赋值为 3。

### 5. 控制变量

参考王磊玲等<sup>[26]</sup>的研究, 从农户个人及家庭特征、宅基地特征两个维度设置控制变量, 具体包括家庭人口结构、受教育程度、宅基地所在地的交通便利性与农户住房结构等。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与赋值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宅基地流转意愿	盘活利用=1; 维持现状=0	979	0.706	0.456	0	1
自变量	政策认知	使用式 (10) 计算而得	979	4.495	2.309	0	10
中介变量	风险态度	非常不愿意=1; 不愿意=2; 一般=3; 愿意=4; 非常愿意=5	979	2.792	1.271	1	5
调节变量	农户类型	纯农户=1; 兼业农户=2; 非农户=3;	979	1.773	0.810	1	3
个人以及家庭特征	家庭人口结构	2人及以下=1; 3~4人=2; 5~6人=3; 6人以上=4	979	2.546	0.744	1	4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1; 初中=2; 高中/中专=3; 大学/大专=4	979	3.049	0.984	1	4
宅基地特征	交通便利性	“高铁、高速公路与普通铁路通达”三者皆无=0; 三者任有其一=1; 三者任有其二=2; 三者皆有=3	979	1.162	0.962	0	3
	农户住房结构	土木=1; 砖木=2; 砖混=3; 钢混=4	979	1.931	0.806	1	4

## (三) 研究方法

### 1. Logit模型

流转意愿为二分类变量, 为了避免基于 OLS 估计的线性概率模型带来的异方差问题, 参考王俊龙等<sup>[27]</sup>的研究, 选用二元 Logit 模型。具体公式如下:

$$Y = \delta_0 + \delta_1 PCI + \delta_2 controls + \mu \quad (9)$$

其中,  $Y$  代表农户闲置宅基地流转意愿;  $PCI$  代表政策认知;  $controls$  代表相关控制变量;  $\delta_0$ 、 $\delta_1$ 、 $\delta_2$  代表待估系数;  $\mu$  代表误差项。

### 2. 中介效应模型

在估计农地流转对宅基地有偿退出意愿总效

应的基础上, 借鉴张勇超等<sup>[8]</sup>的研究方法, 在式 (9) 的基础上, 构建如下模型:

$$RK = \beta_0 + \beta_1 PCI + \beta_2 controls + v \quad (10)$$

$$Y = \varphi_0 + \varphi_1 PCI + \varphi_2 RK + \varphi_3 controls + \varepsilon \quad (11)$$

其中,  $RK$  代表农户风险态度;  $\beta_0$ 、 $\beta_1$ 、 $\beta_2$ 、 $\varphi_0$ 、 $\varphi_1$ 、 $\varphi_2$  与  $\varphi_3$  代表待估系数;  $v$ 、 $\varepsilon$  代表误差项。其他变量含义与上文相同。

### 3. 调节效应模型

考虑到农户类型在政策认知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中可能存在调节效应, 参考方杰与温忠麟<sup>[28]</sup>的研究, 检验农户类型的调节效应。具体而

言,当因变量 $Y$ 与自变量 $PCI$ 之间的关系受到另一个变量 $FD$ 的影响时,称 $FD$ 为 $Y$ 与 $PCI$ 之间的调节变量;当 $FD$ 为分类变量,评估其对 $Y$ 与 $PCI$ 之间关系的影响程度时,需将样本按 $FD$ 的不同类别进行分组,进而分析各组中 $PCI$ 对 $Y$ 的影响。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政策认知	0.123*** (3.157)	0.124*** (3.186)	0.128*** (3.267)	0.128*** (3.263)	0.131*** (3.329)
家庭人口结构		0.163* (1.717)	0.177* (1.867)	0.184* (1.925)	0.182* (1.910)
受教育程度			0.173** (2.437)	0.192*** (2.672)	0.173** (2.351)
交通便利性				0.138* (1.859)	0.146** (1.962)
农户住房结构					0.109 (1.183)
常数项	0.455*** (3.077)	0.868*** (3.068)	0.368 (1.058)	0.490 (1.379)	0.334 (0.882)
观测值	979	979	979	979	979

注: \*、\*\*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量,由列(1)可知,农户的政策认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宅基地流转意愿。列(2)~列(5)是不断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由列(5)可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政策认知提升有利于推动宅基地流转意愿的提高,假设 $H_1$ 得证。

## 2.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从更换基础回归模型、增加控制变量与调整自变量的权重比例三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表3),以确保基准回归结论的可靠性。

(1)更换基础回归模型。采用二元probit模型再次对数据进行回归。由列(1)可知,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验证了前文基准回归结果。

(2)增加控制变量。在原有的控制变量基础上,引入“宅基地面积”这一新的控制变量。由列(2)可知,在加入“宅基地面积”这一新的控制变量后,政策认知依然正向影响农户流转意愿,再次验证了 $H_1$ 。

(3)调整自变量的权重比例。为了进一步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调整自变量的权重比例,将其从“1:2:1”的整数比调整为“0.652:1.274:0.664”的原始的权重计算结果。由列(3)可知,农户宅基地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 基准回归分析

#### 1. 回归结果分析

表2为政策认知对农户流转意愿的基准回归结果。列(1)仅包含政策认知变量与宅基地流转意愿变

流转意愿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再次验证了前文的基准回归结果。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名	(1)	(2)	(3)
政策认知	0.080*** (3.336)	0.132*** (3.341)	0.217** (1.982)
宅基地面积		0.050** (2.341)	
家庭人口结构	0.109* (1.908)	0.171* (1.765)	0.011 (0.765)
受教育程度	0.104** (2.335)	0.174** (2.362)	0.201*** (3.674)
交通便利性	0.087* (1.954)	0.147** (1.970)	0.301 (0.372)
农户住房结构	0.064 (1.162)	0.110 (1.191)	0.018* (1.715)
常数项	0.212 (0.926)	0.390 (1.003)	0.217** (2.125)
观测值	979	979	979

#### 3. 内生性检验

尽管基准模型显示变量间显著相关,但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与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选取“同村其他农户政策认知的平均值( $IV_1-Probit$ )”作为工具变量。内生性检验结果见表4,列(1)~列(2)的结果表明,第一阶段回归系数为0.689,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F$ 统计量为29.36,高于经验值10,表明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的相关性充分,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政策认知对宅基地流转意愿的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初步验证了 $H_1$ 。此外,

为了强化内生性处理的可靠性,引入“家中是否有村干部( $IV_2-Probit$ )”作为替代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阶段回归中工具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537,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 $F$ 统计量为50.37高于经验值10,排除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政策认知的系数为0.149,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支持“政策认知提升显著促进宅基地流转意愿”的核心结论。说明在控制内生性后,政策认知对流转意愿的正向驱动作用依然稳健,表明模型设定可靠。

表4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名	第一阶段	$IV_1-Probit$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IV_2-Probit$ 第二阶段
政策认知		0.523*** (2.641)		0.149** (1.973)
$IV_1-Probit$	0.689*** (3.082)			
$IV_2-Probit$			0.537*** (3.523)	
Wald $\chi^2$		168.54		140.65
Probit $>\chi^2$		<0.001		<0.001
一阶段 $F$ 统计量	29.36		50.37	

#### 4. 异质性分析

(1)地理区位异质性。参考张慧利等<sup>[29]</sup>的研究,将样本划分为“城郊融合区”与“传统农区”(家庭所在地属于县城边缘或市级城市周边的样本归类为“城郊融合区”,其余一般乡村和偏远山区归类为“传统农区”),进行政策认知对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异质性分析(表5)。由列(1)可知,在城郊融合区,政策认知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作用效果显著为正;在传统农区,政策认知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作用效果不显著。这一差异的核心原因在于城郊融合区具备土地增值预期、信息接触、政策执行与配套服务三大优势,三者共同放大了政策认知的积极影响。结合调研访谈与村庄案例,可进一步明确其内在逻辑。其一,城郊融合区靠近城镇核心区,宅基地的资产增值属性取代保障属性成为主导,政策认知的“收益转化效率”更高,正如位于城郊融合区的农户李某所言:“知道县里鼓励宅基地流转,我们村靠近县城新区,流转给民宿老板一年能带来1万多元租金收入,比自己空着强多了。”(访谈记录:20240716村民LMY)而在传统农区,即便农户知晓相关的流转政策,但也因区位条件制约,宅基地流转需求不足,缺乏流动动力,

增值预期差异直接导致政策认知驱动效应的分化。其二,信息接触的多元化程度不同,城郊融合区依托“陇政通”App、宅基地流转服务站等渠道,能为农户提供全面且权威的政策信息,还定期组织政策解读会,方便农户咨询;而传统农区仍以村广播、公告张贴等方式传播政策信息,易造成信息传递不及时、内容不完整等问题。其三,城郊融合区的政策执行与配套服务更加完善,有效降低了流转交易成本,农户通过政策认知了解平台功能后,减少对租金拖欠、产权纠纷等问题的担忧;而传统农区缺乏此类配套,农户即便知晓政策,也会因“不知道找准转”“怕被骗”而犹豫,正如农户张某所言:“知道政策允许流转,但我们这没平台,自己找太麻烦。”(访谈记录:20240710村民ZJF)综上,城郊融合区效应更强的核心逻辑是地理区位优势带来土地增值预期、信息接触、配套服务三大红利,使政策认知呈现“水平更高、收益转化效率更高、交易成本更低”的特征,进而强化了其对流转意愿的驱动作用。

(2)宅基地退出补偿方式异质性。在陇西县宅基地退出政策实践中,不同补偿方式对农户流转决策的驱动机制存在显著差异,而政策认知的作用可能因补偿形式与农户实际需求的匹配程度而产生差异<sup>[26]</sup>。在实地调研中询问农户“闲置宅基地退出应该怎样补偿?”,根据农户的回答将样本划分为偏好现金、房屋安置、就业安置、国家征收补偿四类并分别进行分析。列(3)结果表明,当补偿方式为现金补偿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政策认知提升有利于推动宅基地流转意愿的提高;当补偿方式为房屋安置补偿或就业安置补偿时,政策认知对宅基地流转意愿的作用不显著;当补偿方式为国家征收补偿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政策认知提升有利于推动宅基地流转意愿的提高。可能的原因在于,补偿方式唯有精准契合农户需求、具备高可信度与适配变现能力,才能与政策认知形成协同效应,推动流转意愿提升。具体而言,一是从农户需求来看,县域农户的核心即时支出集中于子女婚嫁、城镇购房、医疗应急与非农经营周转等场景,现金补偿以其即时变现的能力直接填补家庭生计规划中的大额资金缺口,又能依托县域“三权分置”改革赋能

下的数字化直达发放模式,保障资金到账效率与安全性。正如农户陈某所言:“我早就想把老家的宅基地退了,就怕补偿拿不到手,一直没敢申请。后来村里专门讲政策,说现金补偿直接打到我们的银行卡里,15天内就能到账。现在补偿款已经到账,正好儿子要结婚了,需要在城里买房,这笔钱来得太及时了,这种透明高效的补偿方式让我很满意。”(访谈记录:20240716村民CMS)可见,现金补偿的高流动性与农户即时生计需求高度契合,二者共同推动流转决策落地。二是国家征收补偿效果显著,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其依托政府公信力实施,具有高度可信性,并配套社会保障措施,精准适配了农户“风险规避、依赖土地保障”的生计特征。国家征收补偿多与区域发展规划深度绑定,补偿标准透明、公示程序规范,且通常附带失地农民养老保险、

医疗补贴等配套保障,既解决了农户对“补偿款足额发放”的信任难题,又弥补了农村社保体系薄弱的短板,适配了资源盘活能力弱、抗风险能力差的农户的长期保障需求。正如陇西县老年农户王某所述:“我年纪大了,一辈子靠种地为生,没有什么市场化交易经验。国家征收是政府牵头的,村里开政策会把补偿标准、后续养老保险参保流程都讲得明明白白,我对这种补偿方式特别满意。”(访谈记录:20240712村民WJL)三是房屋安置与就业安置补偿效果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其与农户生计依赖模式严重错配,且缺乏足够可信度或变现支撑。具体来看,房屋安置的核心问题是变现能力薄弱与生计需求脱节,就业安置则会产生岗位适配性不足与可信度薄弱等问题,无法改变“需求错配、收益无保障”的本质,最终难以提高农户流转意愿。

表5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名	(1) 地理区位异质性		(2) 宅基地退出补偿方式异质性			
	城郊融合区	传统农区	现金补偿	房屋安置补偿	就业安置补偿	国家征收补偿
政策认知	0.135*** (3.341)	0.032 (0.159)	0.157** (2.351)	0.139 (1.294)	0.037 (0.139)	0.161** (2.083)
常数项	2.027 (1.069)	0.261 (0.670)	0.312 (0.247)	0.461 (0.759)	0.103 (0.127)	2.021 (1.00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53	926	164	328	290	197

## (二) 农户类型的调节效应

农户分化背景下,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模式、资源依赖程度与风险缓冲能力存在显著差异,进而导致政策认知对流转意愿的驱动效果出现群体分化。为此,本研究进一步检验了农户类型在政策认知与宅基地流转意愿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结果如表6所示。由列(1)一列(3)可知,对于纯农户而言,政策认知对纯农户影响并不显著,而对兼业农户和非农户影响显著,即农户类型在政策认知对流转意愿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

为更直观地说明农户类型在政策认知影响农户宅基地流转行为中的调节作用,绘制不同农户类型调节效应图(图2)。图2表明在较高的农户分化水平下,政策认知与农户宅基地流转行为关系的回归线斜率较大,即农户非农收入越高,政策认知对其宅基地退出流转的促进作用越强。可能的原因在

于,对纯农户而言,土地是其生存的核心依托,加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薄弱性,即使政策认知提升,其仍难以摆脱对宅基地的生存依赖,因此调节效应不显著;对于兼业农户而言,其兼顾农业生产与非农就业,既未完全脱离宅基地的生产保障功能,又通过非农收入获得了一定的风险缓冲空间。政策认知的提升能够帮助其清晰权衡宅基地的保障价值与流转的资产收益,但由于仍需依赖土地应对非农就业的不确定性,政策认知的驱动效应受到部分制约,因此调节效应强度介于纯农户与非农户之间;对于非农户而言,其已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宅基地的保障属性弱化,蜕变为闲置资产,其生计来源依赖稳定的非农收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也为其提供了完善的风险缓冲。此时,政策认知的提升能够精准降低制度不确定性,激活宅基地的资产属性,提高农户的流转意愿。综上所述, H<sub>3</sub>得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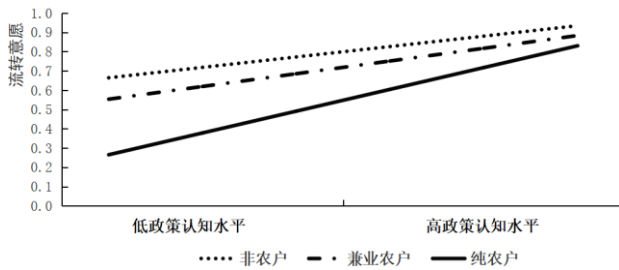


图2 不同农户类型的调节效应

(三) 风险态度的中介效应

根据前文的实证检验，政策认知对农户的宅基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为了进一步验证其具体作用机制，本文借鉴张勇超等<sup>[8]</sup>的研究，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表6）。由列(4)可知，政策认知对农户风险态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列(5)表明，在引入风险态度变量后，政策认知依然显著提高农户的宅基地流转意愿，即农户的风险态度在政策认知对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政策认知的提升有助于农户清晰把握“三权分置”背景下“资格权保留、使用权流转”的核心制度底线，弱化其对“失地即失权”的风险感知，同时帮助农户熟悉流转申请、备案、收益分配及纠纷调解等全流程，缓解其对流转操作过程不可控的焦虑，降低对收益波动与权益受损的主观风险评估，推动农户的风险态度从规避型向偏好型转变，最终提高其宅基地流转意愿。综上，H<sub>2</sub>得证。

表6 调节及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变量名	(1) 纯农户	(2) 兼业农户	(3) 非农户	(4) 风险态度	(5) 宅基地流转意愿
政策认知	0.054 (0.938)	0.166** (1.987)	0.183*** (3.476)	0.014* (1.841)	0.074** (1.981)
风险态度					1.631*** (2.812)
常数项	0.610*** (8.619)	0.487*** (3.337)	0.152* (1.783)	2.311** (2.102)	0.152* (1.71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249	306	424	979	979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利用甘肃省陇西县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探究政策认知、风险态度与宅基地流转意愿三者间的关系以及农户类型在其中的调节效应。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政策认知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且该影响存在地理区位异质性与补偿方式异质性。这一发现优化了既有研究对政策认知作用“普适性”的默认假设，揭示了其影响的差异化特征，丰富了农村土地政策情境下政策认知的行为效应研究。第二，风险态度在政策认知与宅基地流转意愿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这一机制进一步完善了“认知—行为”的分析框架，明确了农户心理在宅基地流转意愿中的重要性，形成了“政策认知提升—宅基地流转风险感知降低—流转意愿增强”的传导路径，打开了“政策认知如何转化为流转行为”的内部黑箱。第三，农户类型在政策认知对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土地生存依赖度、非农收入占比差异等原因导致非农户的流转意愿显著强于兼业农户和纯农户。这一结果不仅回应了“农户分化”相关理论争议，更明确了农户分化是政策认知作用于宅基地流

转意愿的重要边界条件，为理解不同分化阶段农户的政策响应差异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根据区位特征，强化基础服务与环境适配性。针对城郊融合区，重点搭建市场化流转交易平台，规范供需对接、合同备案、价格评估等全流程服务，明确流转价格动态调整机制，降低交易成本；针对传统农区，聚焦基础保障与服务下沉，建立宅基地流转风险补偿金，设立村级流转服务站，搭配“村广播+村干部入户宣讲”的政策传导方式，逐步打通信息壁垒与操作堵点。二是优化补偿形式，推出多元化“菜单式”组合。摒弃单一补偿模式，设计涵盖现金、实物与社保补偿等多种形式的补偿方案，兼顾不同农户的需求差异。如对偏好短期收益的农户，重点推广现金补偿；对注重长期保障的农户，完善社保衔接补偿；对有生产需求的农户，提供实物补偿或生产资料补贴。通过补偿方式与农户需求的精准匹配，强化政策认知的行为转化效应。三是兼顾农户分化，提供全流程精准支持。针对纯农户，除强化宅基地保障功能宣传外，还需配套完善农村养老、医疗基础保障，推行“流转+低保兜底”衔

接政策,缓解其“失地即失保障”的生存担忧;针对兼业农户,要立足“农业生产+非农就业”双重需求,创新灵活流转机制,同时提供流转期间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降低流转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针对非农户,要聚焦宅基地财产功能激活,简化流转审批手续,推出“委托流转+溢价分成”服务,引入第三方机构评估宅基地资产价值,鼓励通过长期流转、民宿合作等方式实现财产增值。

#### 参考文献:

- [1] 陆铭,贾宁,郑怡林.有效利用农村宅基地——基于山西省吕梁市调研的理论和政策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21(4):13-24.
- [2] 姚树荣,赵茜宇,曹文强.乡村振兴绩效的地权解释——基于土地发展权配置视角[J].中国农村经济,2022(6):23-44.
- [3] 李泉.农村宅基地制度变迁70年历史回顾与前景展望[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8(2):114-125.
- [4] 董新辉.新中国70年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变迁、现实困境、改革方向[J].中国农村经济,2019(6):2-27.
- [5] 周小平,高远瞩.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农村宅基地管理政策演进与前瞻——基于宅基地相关政策的文本分析[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0(5):1-7.
- [6] 许恒周,邢新泽.非农就业、基本社会保险选择对宅基地流转的影响——基于2017年CRHPS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21,26(10):250-263.
- [7] 钱龙,陈会广,陈方丽.确权促进了宅基地流转吗?——基于温州农户的调查[J].经济体制改革,2020(2):186-193.
- [8] 张勇超,熊文英.劳动力转移类型、功能诉求与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来自农业转移人口的样本证据[J].地理研究,2025,44(3):731-749.
- [9] 胡方芳,蒲春玲,陈前利,等.欠发达地区农民宅基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24(4):116-126.
- [10] 沈昊婧,冯长春,陈春.人力资本视角下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河南省新乡市为例[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54(3):680-686.
- [11] 吴郁玲,石汇,王梅,等.农村异质性资源禀赋、宅基地使用权确权与农户宅基地流转:理论与来自湖北省的经验[J].中国农村经济,2018(5):52-67.
- [12] 钱龙,钱文荣,郑思宁.市民化能力、法律认知与农村宅基地流转——基于温州试验区的调查与实证[J].农业经济问题,2016,37(5):59-68.
- [13] 彭山桂,孙昊,王健,等.农户互动对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的影响——基于社会网络视角[J].资源科学,2021,43(7):1440-1453.
- [14] 张传,郭贯成,韩述.产权认知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基于代际差异的调节作用[J].资源科学,2025,47(10):2256-2269.
- [15] 许晨曦,陈英,谢保鹏,等.农户政策认知—行为响应路径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宅基地“三权分置”为例[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3,37(1):16-22.
- [16] 王兆林,王敏.价值认知差异对农户宅基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分析[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2,21(6):744-753.
- [17] 陈文娟,王兆林,张云雅.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户闲置宅基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J].中国土地科学,2025,39(3):22-32.
- [18] 郭君平,曲颂.农村人口流动何以影响宅基地流转? [J].当代经济管理,2025,47(9):58-65.
- [19] 吴萌,甘臣林,任立,等.分布式认知理论框架下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SEM模型的武汉城市圈典型地区实证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26(9):62-71.
- [20] Rohit J, Anshida Beevi C N. A framework to study farmers decisions on adoption of agromet advisories services for risk management: Insights from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Bhartiya Krishi Anusandhan Patrika, 2022, 37(1): 66-70.
- [21] 时鹏,余劲.风险预期、市民化感知及农户认知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影响[J].资源科学,2021,43(7):1387-1402.
- [22] 戴其文,周妍锦,胡佳庆,等.生态补偿模式对农户生态保护行为的影响效应[J].经济地理,2025,45(3):139-149.
- [23] 吕晓,臧涛,张全景.土地政策的农户认知及其农地转出响应研究——基于山东省287份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5):100-110.
- [24] 王静,周升强,孙鹏飞,等.风险态度对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影响——基于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检验[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5,39(9):91-100.
- [25] 牛星,周惠敏,吴冠岑.农户分化、财产价值认知与宅基地退出行为[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6):135-145.
- [26] 王磊玲,付楚涵,詹浩文,等.农户收益预期、政策认知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参与行为——来自河南1068农户的验证[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3,37(8):42-51.
- [27] 王俊龙,郭贯成,韩述.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下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其代际差异——江苏宿迁的调研证据[J].经济地理,2024,44(5):172-181.
- [28] 方杰,温忠麟.两类常见的类别变量调节效应分析[J].心理科学,2022,45(3):702-709.
- [29] 张慧利,夏显力.多功能视角下农户宅基地流转行为研究——兼论市场环境的调节作用[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3,37(10):37-45.

责任编辑:黄燕妮